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密码

张可荣,舒迎香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化长期涵育和中国历史长期形塑的结果,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凝成的关系性存在意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一统”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文化理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相映生辉,互动共生,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或曰文化密码。深入研究和传承弘扬这些优质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文化密码;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3;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4-0071-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4.010

The Cultural Code of Form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ZHANG Ke-rong, SHU Ying-xia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has been nurtur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relational existence created by the long-term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is holistic, systematic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featuring "unity", the harmony cultural vision with "harmony as priority" standing in the center,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with patriotism as the core. All of these jointly form a pattern of diversity and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decisive factor or the Chinese cultural code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Studying profoundl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ose excellent characters in culture are important tasks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ode; patriotism

民族与文化构成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人民追寻民族复兴梦想的奋斗中“正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集体意识”^[1]。那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资源、文化根脉和精神纽带

是什么?这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一统”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以“和为贵”为核心的系列和文化理念,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

收稿日期:2021-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63)

作者简介:张可荣(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文化建设等研究;

舒迎香(1997—),女,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

Copyright ©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的决定性文化因素,或曰文化密码。本文试图就此作初步探讨以求教大方。

一、以“大一统”为特征的整体思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文化根基,为凝成牢不可破的“中国”“中华”认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模式

中华“大一统”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整体、系统、辩证思维和包容精神等,彰显了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思想资源。进一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始终贯穿着“大一统”思想的脉搏,为“中国”“中华”认同的日益强化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模式。

(一)中华“大一统”思想起源及其基本含义

“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易经·乾象》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2]。《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最早出现“大一统”一词。在此前后,《诗经·小雅·北山》记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语·宪问》中孔子称赞管仲所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时所讲的“定于一”;《荀子·儒效》所主张的“以一持万”等,都从不同侧面伸张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先民的大一统观念。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以整体观念表达了中华民族先民“追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同样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希望实现政治经济大一统的强烈愿望和思想^[3]。

大一统的基本含义可以作如下解释:“大”即“尊”“贵”,有尊崇、重视、褒奖之义;“一”即元、本源、根本、归于一,包括统摄天地人的道;“统”即“始”,指丝之头绪,引申为总领、统管、统

合、纲纪等义。“‘大一统’思想核心理念就是崇尚统一,主张合而不是分。”^[4]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大一统简单理解为整齐划一的统一,更不能解读为专制霸道。大一统尊崇王道,崇尚和合,相比之下,“大统一”则体现了霸道^[5]。大一统观念在发展过程中从渴望天下安定统一,王权一统,定于一尊,逐渐扩展到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各领域,主张实现政治一统、疆域一统、民族一统、文化一统,强调“继前统,受新命”之“正统”以及崇儒重道之思想文化“道统”。“大一统”思想推动中国社会“构成了从外到内的‘向中看齐’与自下而上的‘向上集中’”的内聚力与稳定性秩序,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则是“使中国境内各民族视统一为正常状态、分裂为非常状态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认知”^[4]。

(二)中华“大一统”思想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中华文化的民本传统与人文思想,以及发达的汉字文化和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等,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关于中华“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文化原因,学者赵汀阳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至少有四个:一是率先具有建构精神世界能力且可以普遍共享的汉字系统。二是在汉字基础上形成的中原文化,“成为当时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释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具有解释万物、人类生活和政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三是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四是周朝创制的天命传承神话作为“一个众所信任的政治神话”,“一种根深叶茂的历史神学”,具有“雪球效应”^[6]。这个论述是符合历史的。

关于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实践,有学者总结为“三个发展周期”,即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的磨合期;隋唐时期是大一统的发展期;元明清是大一统的定型时期^[7]。研究表明,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实践还有一个发生在秦汉以前的“准备期”,即经过距今5300年至4000年前后的“问玉中原”,到距今3500年至3000年前后的“问字中原”,才有22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

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8]。毫无疑问,秦王朝统一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完成”。“所谓民族国家,应该在一民族之上只有一政府,在一政府之下只有一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政府就是中华历代王朝政府^[9]。继秦而兴的汉王朝,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强调“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吉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从此以后,“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变发展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建构大一统的王朝或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10]

(三)中华“大一统”思想牵引下“中国”“中华”认同日益强化

“华夷共祖”“华夷一家”的传统民族观正是在“大一统”思想的牵引下产生的。这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得到充分而又完整的体现^[11],并成为此后在中国大统一王朝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民族观,即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虽然华夏与诸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同时也强调华夏与诸夷、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12]。那么,大一统“统”于谁?就是“统”于“中国”“中华”这两大相互融通的伟大概念。“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前西周初年一件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上^{[13](P298-299)},由此往后得到广泛使用,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广阔疆域内人们对国家、国土、民族、人口以及文化的认同。“中华”概念的产生要晚一些,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譬如淝水之战前的382年,苻融反对苻坚执意攻晋时说:“国家本戎狄,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作为“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的‘中华’,好像一只容器,有容乃

大,好像一块磁铁,吸附周边,‘中华’名号的伟大意义,也正在于此”^{[13](P346)}。

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是交替使用和相互涵括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标识,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大一统与中华文化集大成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智慧。由此形成的“中国”和“中华”认同,具有超越朝代认同、贯通历史、赓续文化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整体意识和统一追求的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始终围绕“中国”“中华”而展开。

自秦汉以来,即使是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往往都自称中国,尤其在分裂时期更是如此。南北朝时期,各朝代都以中国或中华自居,而且互不相让。隋唐统一后,它们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隋唐之后的宋、辽、夏、金,这些王朝无不承袭隋唐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以中国自居。它们与南北朝时期所不同的是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平分秋色,同为中国”^{[13](P316)}。就是说,各王朝各民族成员虽各有其名,但都姓“中国”“中华”,各民族同胞都是骨肉兄弟,各民族历史都是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官修史书皆为中国“正史”,由此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续不断的皇皇“二十四史”。“作为一种数千年延续不断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王朝或国家认同,‘中国’或‘中华’认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14]

二、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文化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原则,为“华夷共祖”“华夷一家”民族观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运行法则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与“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的另一大重要文化思想,就是以“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为核心而构成的“和平”“中和”“和合”等系列和文化理念。这些理念相互连接又各有侧重,经过历代传扬与拓展,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成为治国

安民的重要法则,是“大一统”思想得以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长的重要文化理念和基本实践方式,并且为“华夷共祖”“华夷一家”传统民族观的形成营造了深厚而适宜的社会文化土壤,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5]

(一)中华文化的和平属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了非武力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的和平属性涵养了中华民族和平气质与禀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营造了非武力的文化氛围与历史环境。追根溯源,古代典籍《尚书》便提出了和平与“协和万邦”的理念。《尚书·虞书·尧典》有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原文的意思是,尧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也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也就是各个邦国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这是中华民族先民对和平向往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代,诸子百家对战乱的追根溯源,对和平的期盼与讨论,以及王道霸道之争、义利之辨等,无不深化了中华民族对包括“和平”在内的系列文化理念的认识与理解。作为著名兵书《孙子兵法》中的《始计篇》第一句便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另一部古代兵书《司马法》在开篇的《仁本》中明确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围棋同样体现了重布局而轻杀伐的和平思维。中国汉字“武”表达的亦是“止戈为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16]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与止战慎战思想,在民族关系上则体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平性,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虽然免不了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歧视和压迫,但却主要是在和平环境下展开的,即使是战争也不是相互灭绝。学者许思园通过中外比较得出结论:“古代世界各大民族唯有中国不以征服异族开国。广土众民,混融夷夏,大一统之形成,主要在于和平同化,而不由武力经营。”^[17]

(二)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了方法论

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体现在中华民族为人处世与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提供了方法论。周太史史伯曾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思想观点,认为天下生命都是不同的生命元素相和合的产物,史伯也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以和合说解释阴阳五行学说的人^[18]。春秋战国时期,和合思想在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得到了充分阐发,《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礼记·中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陈寿《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八字古语,用羹汤之所以美味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来引伸发展和合思想,可谓精到而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等政治智慧的统领,它为什么能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东方?”^[19]

(三)中华文化的中和理念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

中华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大一统”思想相辅相成,是“中国”“中华”认同的又一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中和”理念

与和平、和合、大一统理念一样,产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同、中国国家的形成与认同密切相关。最早将“中”“和”合并使用的是《礼记·中庸》,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与“和合”相互融通,但意涵并非完全等同,而是各有侧重。在中华文化里,“和合”重在“合”,“中和”强调的是“中”。这里的“中”不能仅仅从方位上理解,应当主要从文化上解读,即“中和”之“中”强调的是天下大道、人间正道,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核心,也是中华文明多姿多彩之枢纽。正如学者刘庆柱所指出的,学术界对于“中”“中和”的阐释“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中’与‘中和’解释为‘中庸’”。实际上,“‘中’‘中和’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和’就是‘多元’之‘和’于‘一体’,‘一体’就是‘中’,‘中’是‘核心’,‘中’与‘中和’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核心思想。”^[20]

(四)中华和文化理念催生了文化族类观和朴素的民族平等与融合意识

中华和平、和合、中和理念与“大一统”思想相辅相成,互动共生。大一统是重和平、尚和合、致中和的大一统,其在民族关系上的核心观念,如上文所述,是“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其标志性符号是“中国”“中华”。而以“和为贵”为核心的系列和文化则是追求乃至实现大一统的和文化理念,是实现大一统的不二法门,其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是文化族类观和朴素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意识。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观属于典型的文化族类观,无论是先秦时期产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华夷之辨”,还是后来日益凸显的“华夷一统”,华与夷的区分并无显著的种族血统意义,而是强调文化要素与文化属性。正像韩愈在《原道》中所言:“孔子做《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

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所谓朴素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观念,早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就得到鲜明体现。譬如《论语》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提倡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等。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更是突出表达了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意识。后来,《晋书·卷六六·刘弘传》提出的“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送柴侍御》中表达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同样反映了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的思想。当然,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总之,中华民族在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自在演进时期,中华王朝即使处在分裂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脱离大一统的框架体系与和平、和合、中和思想的牵引,而是呈现出形散而神不散的“貌离神合”之气象。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强大精神纽带,为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最深厚的精神滋养与力量支撑

爱国主义是一种家园情感和故土意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觉意识与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赋予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生命个体与国家命运与共的辩证关系。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最优秀的精神文化基因。“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内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构成了属于‘自己’的身份标识和‘我们’的族群归属。”^[21]

(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淡薄。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误读,抑

或是某种程度的以今度古。早在先秦时期,在大一统政治思维中已经生成了传统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并且把这种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视为生命个体的道德责任与使命担当。

在中华传统典籍中,“社稷”“国家”“天下”都是常用词汇,爱国、救国、报国、兴国都是代代相传、贯通古今的主流意识。从晏子“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七》);左丘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孟子·离娄上》)到唐代李白“报国有长策”(《赠从弟冽》);宋代陆游“报国寸心坚似铁”(《大雪歌》)再到清代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以及近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等,这些代代相传的名言警句,无不饱含家国情怀,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永久的典范。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2]

(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强烈的家国情怀

今天,我们用极具伦理情感色彩的词汇把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述为“家国情怀”或“天下家国情怀”,以彰显“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基本内涵。有学者把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视为“中国人的信仰”^{[23](P55)}是有历史文化依据的。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孕育直接与传统宗法制度相关联,即把个体置于血缘人伦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生命共同体,体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传》)由此推己及人、由家到国乃至天下,形成良性互动。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的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同,成为家国情怀生长绵延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24]。与此同时,中华“大一统”思想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方式,中华系列和文化理念所包含的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等思想,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观

念等,都与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构成相融共生关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有两种运思方式:一种是从生命个体到天下,即《礼记·大学》所载的“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种是从天下到生命个体,即《孟子·离娄上》所表达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论是从个体到天下还是从天下到个体,“‘家’是生命的接力,突破的是生命纵向的限度;‘国’是生命的互助,突破的是生命横向的限度。纵横交织,经纬交错,织成一张生命之网”^{[23](P55)}。这样,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着四个同心圆的命运共同体,由内而外,依次拓展,“最内圈的命运共同体就是‘生命’;第二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家庭’;第三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国家’;最外圈的命运共同体叫作‘天下’”^{[23](P151)}。“‘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25]

(三)数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谱写了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10]汉唐时期的“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进藏”是流传甚广的爱国主义佳话,反映了强汉盛唐时期的民族和亲与民族团结。“凉州会盟”是元朝时期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元朝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于1247年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市)白塔寺举行的会谈,双方达成了著名的历史文件《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由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瓦氏夫人抗倭”发生在明朝,作为广西壮族人的瓦氏夫人,为抗击东南沿海长期存在的倭寇袭扰进犯,主动请缨带兵抗倭,为保国安民立下

了战功,被明嘉靖皇帝封为二品夫人。“土尔扈特万里东归”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曾经远走额济勒河即今天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毅然跋涉万里东归,回到祖国怀抱,这一英雄壮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锡伯族万里戍边”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锡伯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1764年,生活在我国东北的锡伯族4000余名官兵及其家眷奉朝廷之命,远离故土奔赴新疆伊犁戍守边关至今,为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一个民族的牺牲和贡献。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也即是说,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长期历史演化中逐步形成和凝聚起来的共识性意识,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大一统”思维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和辩证思维,以“和为贵”为核心内涵的中华和文化理念,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等,是涵育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定性因素,或曰文化密码。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具有绵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入研究其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有联系,但绝对不是一回事,不能拿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解读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 王文光,徐媛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J].思想战线,2018(2):70-74.

[2] 季桂起.略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涵义[J].德州学院学报,2019(5):36-40.

[3] 陈喜波,韩光辉.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3):58-63.

[4] 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14-18.

[5] 韩星.“大一统”辩证[N].北京日报,2021-01-04.

[6]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46-49.

[7] 陈喜波,韩光辉.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3):58-63.

[8] 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107.

[9] 钱穆.民族与文化[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140-141.

[10]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11] 王文光,翟国强.“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3):1-8.

[12] 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J].贵州民族研究,2017(4):1-6.

[13] 胡阿祥.吾国吾民: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1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

[1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7.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5.

[17] 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M].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72.

[18] 龚群.和实生物,美美与共[N].光明日报,2019-06-10.

[19] 张可荣,刘奕汝.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75-83.

[20] 刘庆柱.“中”与“中和”理念的考古学阐释[N].光明日报,2021-01-13.

[21] 王永贵.运用辩证思维奏响新时代爱国主义乐章[N].光明日报,2020-07-20.

[22] 鲁迅.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

[23] 刘哲昕.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

[24] 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N].光明日报,2019-10-07.

[25]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上海:三联书店,2010:20.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